

# 中外名人傳

(二十一)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七十四頁)

## 周昆田 (一九〇六一—一九八九)

新疆日報社社長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國防研究院講座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周昆田字彥龍，安徽合肥人，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廿六日生，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因病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四歲。

世居合肥南鄉，耕讀相傳。六歲入私塾，因病停學三年，九歲復學，到十七歲讀完了四書，詩書易春秋，對於唐宋詩辭、綱鑑、王陽明傳習錄等，也曾擇覽，由是奠定了國學的根柢。

一九二一年秋進入合肥縣城第二高等小學，因學業成績特優，一年即畢業，隨即考入第六師範學校，完成六年學業。一九二八年秋到上海，入私立上海法政大學。第二年轉到胡適之為校長的中國公學大學部，因費用昂貴，負擔過重，自願降低一學年考入國

立勞動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系。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東北，「九一八」事變爆發，接著上海發生「一二八」戰事，日軍攻打上海，勞動大學校舍毀壞，租屋上課，教育部將學校院系歸併，原來勞大經濟系，歸併到中央大學上海商學院，到一九三二年夏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暫回安徽合肥，在省立第六女子中學執教。

一九三五年春夏之間，貴州省政府主席吳忠信(禮卿)，徵召長於寫作的鄉邦青年才俊，應召被延攬為機要秘書，很受器重。第二年吳忠信調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亦跟隨出任簡任秘書。

周昆田研習經濟，因國學根柢深厚長於文史，現有機會與邊疆事務直接接觸！深覺邊疆問題與國家民族關係密切，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學術問題，於是立下從事邊疆行政的決心，並致力於邊疆問題的研討。

一九三九年秋，西藏第十四代達賴喇嘛轉世坐床，吳忠信委員長奉派赴拉薩主持。事先成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周昆田任

秘書兼第三組組長，隨同經由印度，長途跋涉進入西藏，歷時近一年公畢始返回重慶。

這次吳忠信主持西藏政教最高領袖坐床大典，又設立中央駐藏辦事處，恢復搖搖欲墜的西藏主權，改善對西藏的關係，功在國家，而他努力協助完成任務，也功不可沒。

一九四二年八月，經發起組織中國邊政學會，發行邊政公論月刊，他兼任主編，發表有關邊疆政策及邊疆問題的研究，頗具權威。

同年十月任西北考察團秘書，隨吳忠信團長赴甘肅、寧夏、青海，多方協調，謀求團結、安定，支援抗戰建國。一九四三年夏蒙藏委員會為積極推動工作，要他擔負重任，晉升為蒙藏委員會委員。秋間並與吳忠信委員長一同陪蔣介石主席及夫人宋美齡女士巡視西北各省。

一九四四年八月吳忠信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周昆田被任為省政府委員兼省黨部委員，就職後又兼新疆日報社社長。新疆遙懸塞外，環境特殊，自一九三三年盛世才主政

，採用親蘇聯政策，助長了俄人侵略邊疆的凶燄，當吳忠信到迪化（今名烏魯木齊）不久，蘇俄發動了伊犁事變，阻撓中央政策的推行。他殫精竭慮，協助吳忠信主席一一化解衝突。

一九四六年夏，伊犁變亂和平解決，新疆省政府改組，吳忠信主席辭職，周氏代辦移交後回到首都，復任蒙藏委員會委員，至一九四八年秋，遞補為副委員長。

一九四九年秋，中央政府南遷廣州，八月西北形勢逆轉，情況十分危急，他奉行政院長閻錫山的命令，到新疆處理，達成任務後歸路斷絕，於是與中央在新疆的忠貞軍政人員，取道南疆，越帕米爾高原東還，他臨危受命，冒險犯難的精神，令人欽佩。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來台，周氏升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一九五〇年三月，內閣改組，五月十六日卸任委員長，改任行政院顧問。一九五一年，受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四年，轉任為光復會委員兼召集人，對於邊疆各項方案及問題的研究，不遺餘力，貢獻很多。復受聘為蒙藏委員會榮譽顧問。

一九六〇年起先後奉派為國民黨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委員。一九七二年六月，轉任考核紀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九七六年任中央評議委員，但仍繼續寫作。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五年，歷任國家建設會計計劃委員、國防研究院講座兼政治研究

所長，首席講座、中國文化大學研究所所長、兼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兼任教授、代所長等職，共歷十年。

周氏一生著述很多，絕大部分是關於邊疆問題的論述，計有：中國邊疆民族簡史、邊疆政策概述、三民主義的邊疆政策、邊政總論等。另有論文多篇分載於「邊政公論」、「中國邊政季刊」、「中外雜誌」及「東方雜誌」中。

用昆田夫人安曙雲天津市人，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在迪化結婚，育有子女三人，長子祖康、長女智林、次女慧林，都已成家立業，服務社會。（吳化鵬撰）

## 朱慶瀾

（一八七四—一九四一）

東省特別行政區長官  
國民政府賑濟委員長

### 受趙爾巽賞識出仕

朱慶瀾，字子橋，祖籍紹興錢清漁後村，父名錦堂，太平天國時攜眷北上山東，曾任歷城縣刑名師斧。慶瀾便生於山東歷城縣。五歲喪父，十四歲喪母，自小孤貧力學。十九歲開始當下級官吏。一九八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後隨軍赴登州海防。

後歷任奉天、鳳凰、錦州、安東縣知縣等職，深為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賞識，後隨趙爾巽移鎮巴蜀。一九一一年，因治軍有方，

趙爾巽奏為陸軍協統，又任第十七鎮統制。

清末，被賞授花翎、二品街道員和陸軍副都統。武昌起義，川軍響應，朱被推為四川大漢軍政府副都督。一九一三年任黑龍江督署參謀長、護軍使兼民政長、鎮安右將軍兼巡按使。首營邊界國防工事，收回松花江航運權，民衆命名新江輪為「慶瀾號」以誌其功。一九一六年七月，時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任其為廣東省省長。慨然響應孫中山「護法運動」，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孫中山率起義海軍及部分國會議員抵粵，受到他的歡迎與支持，以二十個營付與孫中山，奠定民國軍政府之基礎。段祺瑞對此十分不滿，下達了將朱慶瀾與廣東省省長劉承恩對調的命令，朱慶瀾以廣東自主為由，拒不執行命令。俟軍政府站穩腳跟後，將省長印交省議會，隻身離粵，踐「粵人治粵」之議。自此致力於民生大計，創設華盛星公司於蘇北，使射陽河北岸化為膏腴，附近百萬民衆獲益。一九二二年應張作霖之邀，重返東北，任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兼東省特別行政區長官，從蘇俄手中接收路權及沿路土地百十萬畝。並平息匪亂，大興社會公益，曾設立廣益、崇德兩中學及俄文學校。後又創辦平津關外義賑，移山東難民十餘萬於東北耕作，組織華北慈善聯合會，救濟冀魯豫三省及天津災民百餘萬人。「九·一八」事變後，與程潛、張學良等建立遼吉黑熱四省抗日後援會，出任會長，

援助察哈爾、長城喜峰口諸戰場，力挫日軍氣焰。

### 封存法門寺地宮文物

一九二五年二月辭職後，朱慶瀾長期從事慈善救濟事業和抗日救亡運動，為賑災護國奔走呼號，不辭勞瘁，有「慈善將軍」之譽。

一九二九年，陝西大旱，全省災民達六百五十多萬。朱慶瀾以「華北慈善團體聯合會會長」名義，組織社會各界倡導「三元錢救一命」之義舉，倡修關中諸佛寺聖跡，以工代賑，先後重修了華嚴初祖杜順和尚塔，四祖清涼國師澄觀和尚塔，玄奘、窺基、圓測諸塔及大雁塔、千福寺、太平寺、龍光寺等處。在重修唐時皇家寺院法門寺時，從佛祖真身寶塔各門洞取出六十八尊明代供奉的銅佛像和許多珠玉法器及所藏經書三百餘卷。對於這些寶物，當初意見不一，後依主辦人朱慶瀾的主張：原塔封存。他認為移存它處，不免散失或被盜，「佛像不可與古董等同，沽價交易。」匠工在塔基施工中又發現了塔下地宮。當民伏清理完浮土時，便顯露出了千多年未受騷擾的法門寺地宮，從明代探地宮的殘角撬開觀看，但見裏面珠光寶氣、琳琅滿目，重重摞摞的金銀器皿，珠玉寶石密密麻麻聚在一起群星璀璨。這是一個金銀的王國、絲綢的世界、珠寶的海洋。有人試圖點上燭火進去看個究竟，一股陰暗發

霉的刺骨寒風撲面而來，燭火熄滅了。從黑暗的地宮兩側又悄然爬出了無數青蛇，向四面八方一陣亂竄迅速沒了踪影。在佛祖的土地上動土，人們本來就心虛，這一驚一嚇，頓時不知所措。朱慶瀾聞訊，細心察看一番後，口稱「與此無緣」，指令任何人不得擾動，塔內塔下所有物品均應放置原處，立即填上泥土，照原樣封存，同時封鎖消息，不准四處傳播。他嚴重告誡在場的知情者：「國難當頭之時，寶物不可輕取，萬一散失，後果不堪。修塔不是為了盜寶，而是為了護國息災。請各位起誓，堅決嚴守秘密……」這樣，這批唐代所珍藏的一千多件金銀器皿，珠玉寶石和四枚佛家至尊玉聖的佛指舍利才得以保存了下來，為在鼎盛之世的八十年代的重新發現建立了不滅的功德。

### 關心桑梓出資辦學

一九三二年，朱慶瀾偕教育家陶行知同到紹興錢清漁後村，出資創辦漁後小學，建造校舍五層樓。校舍建成後開始招生，條件是凡是漁後村人，不限姓氏，不論貧富，全部免費入學，對貧苦兒童入學還發給衣服、零用、雨具等物。但當時漁後農村，風氣不開，不愛讀書，雖有此良好條件，求學者仍寥寥無幾，不能招滿名額。其中有一學生許長生，年十四歲，品學兼優，朱慶瀾指示校長沈炎迷選其去「上海公學」進行培養，所需學雜費用和生活費用每期由該生去向朱慶瀾的刺骨寒風撲面而來，燭火熄滅了。從黑暗的地宮兩側又悄然爬出了無數青蛇，向四面八方一陣亂竄迅速沒了踪影。在佛祖的土地上動土，人們本來就心虛，這一驚一嚇，頓時不知所措。朱慶瀾聞訊，細心察看一番後，口稱「與此無緣」，指令任何人不得擾動，塔內塔下所有物品均應放置原處，立即填上泥土，照原樣封存，同時封鎖消息，不准四處傳播。他嚴重告誡在場的知情者：「國難當頭之時，寶物不可輕取，萬一散失，後果不堪。修塔不是為了盜寶，而是為了護國息災。請各位起誓，堅決嚴守秘密……」這樣，這批唐代所珍藏的一千多件金銀器皿，珠玉寶石和四枚佛家至尊玉聖的佛指舍利才得以保存了下來，為在鼎盛之世的八十年代的重新發現建立了不滅的功德。

瀾的堂弟朱子千處領用。

一九三六年，朱慶瀾最後一次來漁後村探親，邀集村里父老商討在村里辦一所紡織二廠。他說故鄉群眾生活貧困，必須辦紡織廠，使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大家富裕起來，但正在籌建中的紡織廠因抗戰爆發而停建。自此，朱慶瀾再沒能來家鄉。

一九四一年，時任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委員長的朱慶瀾積勞成疾，病逝於西安，葬於長安縣杜曲鄉東草村，享年六十七歲。

參考資料：《法門寺志》《浙江省人物簡志》（陳雪琴撰）

### 姚琮（一八九〇—一九七七）

南京首都警察廳長

內蒙宣慰使

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總統府戰略顧問、國策顧問

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前國大代表、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教授姚琮，雖是軍人出身，卻飽讀詩書，學問淵博，尤其對古詩詞的造詣，已到無所不精的地步。晚年卸除軍職，執教上庠，即以古詩詞傳授學生，講解透徹，徵引廣博，深受愛戴。

姚琮字味辛，浙江瑞安人，幼時和孫徵（詒讓）結伴讀書，成為畢生好友。兩人皆喜閱讀，至老不輟。而姚琮對於古詩詞尤為

愛好，讀盡所有的詩詞，咀嚼其中的奧妙和精微，很有心得。三原老人陳散原讚美他「氣格渾健、神致秀逸、天秉疏庸」，陳散原為中國古典文學名家，為隋唐史大師陳寅恪之父。受此名家品題，身價自是不凡，但姚琮沒有興奮之情，反有愧不敢當之嘆！後來他又結識清末名臣康有為（南海），隨康有為遊天台及雁蕩山，跟康氏習書法，盡得康氏筆法之妙，曾仿康有為書寫大字，鐫刻在南雁蕩的摩崖之上，平陽孝廉劉紹寬曾吟詩一首讚譽之。

一九〇七年姚琮投筆從戎，考進保定軍官學校習軍事，立志富國強兵，軍事救國。在保定軍校和蔣中正總統為同期同學。三年後畢業，任浙江陸軍第八十二標排長。辛亥年，武昌起義前夕的九月十四日夜，浙江督署起火，姚琮堅守崗位，不為所動，次日晨，火光熊熊，在東轅門遇到蔣中正，兩人相視而笑。事後賦詩曰：

「手提短劍下江城，鶴立轅門一小兵。今日乾坤歸再造，不須恩怨更分明。」

以後，姚琮隨軍赴南京，再進據宿州，在宿州他致電清軍統帥段祺瑞（芝泉），促段統兵反正，支持國民革命，電文是：「清政不綱久矣，革命健兒風興雲湧，澄清在即，憂心未已，惟念吾師門生故舊半天下，登高一呼，萬山必應，漢室旌旗百姓所望，臨電神馳，無任依戀。」後來他聽說段祺瑞對人說：「姚琮很有膽識」，其實他當時年僅

二十二歲。

一九一四年，姚琮考進陸軍大學深造，畢業時適逢袁世凱稱帝，乃返回浙江出任討袁軍參謀長，陳兵蘇浙交界處，待機進擊。同年冬，浙江境內有夏超作亂，他遂返回浙江，勸師長童某討伐，童不聽，這時，北洋政府發表楊善德為浙江都督，浙人大譁，乃和蔣中正共同往訪童師長，勸童某先安定浙江，揮兵平亂，無結果，姚琮乃於一九一八年赴福建，任職步兵第二、三兩團砲兵隊。

一九二〇年，駐閩軍因爭奪鹽稅而發生譁變，姚琮不願分肥，率軍討之，事後因功升任步兵第二團團長，乃和蔣中正共同遊說師長潘國綱，促潘率軍出浙江援粵，潘不聽，但卻對姚琮說：「蔣中正非常人也！」

同年，姚琮隨軍撤師回浙，駐節浙西，不久，奉令兼任台州戒嚴司令。一九二四年浙江軍閥混戰，姚琮辭職，一九二五年，回廣州任黃埔軍校總教官再轉任校長辦公室主任。翌年，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長，隨軍北伐，軍次南京，第三軍譁變，好在革命軍戒備森嚴，幸無事故。這時受傷的士兵鬧事，姚琮前往慰撫，亦告平息。積功升任警備第一師師長兼南京要塞司令，和直系軍閥孫傳芳隔江對峙數月，前線炮聲隆隆，但市區秩序井然。接著孫傳芳部進犯龍潭，姚琮率軍參戰，大破孫軍。龍潭之役後，姚琮調任首都警察廳廳長，是為南京首任警政首長，他立制度，訂章程，完成警察建制，

垂之久遠。不久，西北軍石友三部叛變，進據浦口，南京危殆，姚琮於深夜密報蔣總司令，蔣中正披衣而起，妥加部署，卒平定石友三部。事後，奉派赴日本考察警政，半年後回國，改任軍事委員會副官處處長兼第三廳副主任。

一九三六年初，蔣中正赴四川剿共，於五月五日回到南京，當時有數千人到明故宮前列隊歡迎，姚琮以成員複雜，領袖安全可靠，乃囑部長級以上官員留下，其餘的人留下名片回去，不料此舉果然免去一場驚變，據行刺汪兆銘的凶手項仲霖供稱，以是日未得一擊蔣中正為憾。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全面抗戰，姚琮調任軍事委員會管理一部部長兼代部長，建議蔣中正於淞滬一帶佈防決戰，以平津為副戰場。姚琮指陳此舉有五利：一、指揮便利；二、集軍容易；三、補給便捷；四、江南港汊縱橫，不利於日寇；五、易引起國際觀瞻，得道多助。蔣中正從之，國軍在京滬血戰四月，直到南京失守，國軍後撤，當時軍不成列，秩序大亂，姚琮請決黃河堤防引人阻遏敵勢，適日軍飛機轟炸，誤毀趙口河堤，黃河一瀉千里，漂沒十餘縣，直達江淮，阻滯日寇西犯長達兩年之久，國軍得以從容部署禦敵，以後國軍的多次大捷，與這次作戰有很大的關係。

撤抵重慶後，姚琮調任軍委會辦公廳廳主任，奉令到內蒙宣慰，上書蔣中正說：「

(二二) 傳人名外中

竊職謬承知遇將四十載，追隨左右亦二十年，行能無似無補時艱，茲當遠離有不能已於言者。敬陳概梗，伏惟垂鑒：自鼎革以還，國家多故，幸賴鈞座宵旰憂勤，使積弱之邦躋四強之列，子孫萬世實利賴之。惟求治至急，易發盛怒，使聞之者惶恐罔措，竊期期以為有不可者四，不必者二。鈞座一身繫天下安危，康強愉悅實為衆所共望，而怒能傷身，正宜節制，不可者一；民國二十三年職于役南昌，聞某秘書長語人曰：「凡有簽呈與吾善者則於鈞座喜時陳之，與吾惡者則於怒時進呈。」古之權臣往往如是，鈞座宜有以知之，不可者二；孔門弟子三千，惟顏回能不遷怒，誠以喜怒哀樂一不中節，即失心氣之平，而措施亦易失當，不可者三；怒能激人，亦能拒人，拒人則賢者畏蕙不前，直言罔進，上下隔闕，不利莫大焉，不可者四；鈞座德望化及群倫，僚屬祇畏，何用怒焉？不必者一；凡得近鈞座者，不為人望，亦必為知名之士，潔身自好，當不後人，倘蒙譴責，已羞慚無地，何待於盛怒？況國家待士貴養廉恥，不必者二。夫欲去此四不可，二不必，先應平心靜氣，欲平心靜氣，又當從主敬始。曾文正謂學「敬」字二十年未嘗有成，此為其自謙之詞，而亦從知其不易學也。鈞座平生慕文正之為人高掌遠躡，何待喋喋？然緘默辟嫌非所以事上之道，乃敢率直陳詞，幸祈鑒其狂愚而矜憐之，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率直陳辭，蔣中正深為嘉納。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姚琮調職復員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共黨擴大叛亂，國共大戰，禍患頻仍，美國派魏德邁中將再度來華調處，姚琮訪晤魏德邁，告訴他說：「惟以與將軍有一日之雅，今將軍奉使而來，值茲危局，宜進一言，幸鑒諒焉！曠觀中外亂象，皆起自共產，我國殆其小焉者耳，然彼輩有武器，有土地，有奧援，且其力幾與蘇俄相埒，自與別國共產迥然不同。況殘殺成性，曾不顧國家民族，惟群獠（指第三國際）之命是聽，其意不僅竊國，必殺盡彼輩。所謂「攜貳者以固其位」故常曰我國留三億人足以立國，洪水猛獸無此殘酷，倘欲剪除之，非內戰也，將以斷蘇俄之左臂，拆群獠之右肩，是為世人自由而戰，故調停國共與夫重歐亞二說，皆為養癰貽患，何則請看馬歇爾奔走調停之日，彼輩則增其武力，廣其土地，高其名位，長此以往，正恐所議未成而寇已深矣，誤盡蒼生莫此為甚。倘使彼輩一旦得志於中原，則合蘇俄及其附庸國人口不下十餘萬萬人，幾占大地人口三分之一，所佔土地亦如之。乘勝而南，則印、緬、越、寮勢將不保，南洋群島亦無寧日。試問列國處此情勢，寧不慄慄自懼？故為貴國百年計，應仗義執言，劍及履及，非惟救災恤鄰，亦所以自善其後也，不此之圖，吾恐後之為計者，必什佰艱難於今日。言盡於斯，幸詳察焉！」

姚琮的話，不幸一一應驗，僅為時兩年，大陸全面陷共，政府播遷來台，魏德邁無功而返。來台後，姚琮調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再調總統府國策顧問。在大陸時，他已當選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及選任制憲國大代表，來台後，參與憲政研究，貢獻卓著。退役後，執教大學，先後任文化大學及東吳大學客座教授，教課之餘，勤於著述。著有「日本警政考察記」、「史途飛雲雜記」、「味筍齋詩文鈔」、「天遊詩草」、「讓金村人墨蹟」等書。（蕭新民撰）

**朱紹良 (一八九一—一九六三)**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甘肅省政府主席  
重慶綏靖公署主任  
福州綏靖公署主任

**在閩出生成長讀書**

抗日名將朱紹良原名朱寶瑛，因欽慕漢初三傑之一張良的事功，改名朱紹良，字一民，又自署逸民，生前軍階為陸軍二級上將，一九六三年去世後，追晉為一級上將。從軍五十餘年，屢膺重寄，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甘肅省政府主席、第八戰區司令長官、重慶綏靖公署主任、福州綏靖公署公署主任。他畢生最大的功勳是說服「新疆王」盛世才歸順中央，把新疆經蘇俄勢力範圍內拉回中華民國懷抱。

朱紹良原籍江蘇省武進縣，因其父在清末任福州南台海防同知，所以他於一八九一年十月廿八日生於福州，雁行多達十人，他排行老么。由於其父為武官，任所不定，使他一直到了十六歲才正式入學，就讀福州竟成兩等小學，暑假隨福建孝廉程希箴攻讀詩詞，奠定國學的根基，十七歲轉入福建陸軍小學習軍事，該校聘有由日本士官學校留學歸來的畢業生擔任隊長，還聘有日本教官教習兵操，訓練較為嚴格。兩年後，十九歲的朱紹良升學南京陸軍第四中學，未畢業，即被選送日本振武學校，一九一〇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成了革命志士。

### 與何應欽交稱莫逆

一九二一年九月，其父朱清澤病逝，他回國奔喪，十月，武昌起義成功，他前往漢口，入陳其美的滬軍都督府任參謀。同年冬回福州，擔任福建陸軍小學教官，一九一三年回到部隊，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避往日本，再入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一期砲科當學生，和何應欽、谷正倫、賀耀祖同屬宇都宮步兵第五十九聯隊，因同學關係和何應欽交稱莫逆，後來義結金蘭。爾後事業發展，也相輔相成，而被人戲稱為「朱不離何，何不離朱」，儼然岳飛帳下的「焦孟二將」。

一九一六年，朱紹良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奔赴駐在福建的革命軍黃大偉部任

參謀，當時蔣中正也在黃部任營長，兩人即告結識，貴州籍的何應欽回國後則投身黔軍，電召朱紹良前往，同時赴黔的還有谷正倫、張春浦、李毓華和王純祖。當時正值護法戰爭時期，貴州已宣布獨立，組成護國軍。他們抵達貴州，受到黔軍東路司令官王文華的歡迎和重用，分派到貴州講武學校當教官，並協助辦理模範營，培訓黔軍新軍。

護法之役不久結束，王文華出任黔軍第一師師長，朱紹良派任團長，不久，調任師參謀長。一九一七年八月，黔軍和滇軍、川軍為爭奪地盤發生戰鬥，朱紹良隨王文華的第一師出黔，攻擊川南，九月作戰失利，黔軍退出川境，但是滇軍唐繼堯要求黔軍再出兵，於是王文華又率軍出擊。這時朱紹良任師部參謀長，和滇軍配合，分兵奇襲重慶，迫川軍撤出川南，十二月，黔軍佔領重慶，朱紹良被任命為重慶衛戍司令，並在王文華離重慶時，代理黔軍總司令，由於策劃周詳，領導有方，一時被譽為「黔軍小諸葛」。

一九二〇年，四川各地軍頭達成協議，聯軍驅逐黔軍，十月，黔軍退出重慶，王文華回黔，欲奪取軍政大權，但因掌握貴州大權的劉顯世為其母舅，不好下手，乃稱病到上海養病，朱紹良隨護，初涉十里洋場的王文華，目眩五色，流連風月場合，並計畫納妾，已擇定一美女，不料花燭之夕，遭人狙殺於一品香門前，一命嗚呼。朱紹良失去憑依，消沉了一陣子。

一九二三年初春，朱紹良到了廣州參加革命軍，三月，被大元帥府委為大本營參謀，不久，黔軍向革命陣營輸誠，奉派為駐粵黔軍參謀長，他辭而未就。次年二月，楊庶堪任廣東省省長，由於朱紹良在四川時和楊氏有過交往，即延聘他為廣東省政府顧問，但他只幹了四個月，即因志趣不合辭職回到上海。回滬以後，沒有收入，又無積蓄，生活困苦。在薩波賽路租了一間小閣樓，偕妻女居住，靠典當渡日，每天到證券交易所領取國民黨秘密補助的五角大洋。莫小看這五毛錢，當時在上海已可維持一個人的生活，朱紹良攜有妻女，開支就不夠了，靠典當貼補。

後來，孫中山在粵組成軍政府，電召朱紹良赴粵，但不得攜眷，朱紹良只好把妻女託友人照料，隻身抵達廣州，晉謁孫中山，奉派為大元帥府諮議，不久，又轉任第十師師長陳銘樞的參謀長，收入固定，生活始告好轉。

### 北伐作戰立下戰功

一九二六年春，北伐誓師前夕，朱紹良在廣州蒙總司令蔣中正召見，慰勉有加，北伐開始後，隨第十師參加汀泗橋、賀勝橋戰役，立下戰功，於是次年二月，朱紹良升官，奉派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武漢行營參謀長，當時的武漢衛戍司令唐生智，予智自雄，心懷二志，對中央派來的朱紹良非常注意



，準備有所行動。朱氏於到任一個月後即告察覺，乃於三月十六日金蟬脫殼，由武昌乘專輪回漢口途中，令船東向九江，再到南昌，回到總司令蔣中正的總部。三月底，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五月，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朱紹良抵南京，奉派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七月六日，國民政府特任軍事委員四十六位委員，朱紹良是其中之一。這時，國民黨內派系傾軋激烈，各地軍頭脅迫蔣中正下野，蔣氏於八月十三日宣佈辭職，朱紹良亦隨之去職。

不久，朱紹良秘密籌謀牽連各主要將領，擁護蔣中正復職，由朱紹良領銜發出第一封通電，接著擁戴的通電紛至沓來。蔣中正接電後由日本回國，經上海回到南京，於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正式恢復本兼各職，揮軍再度北伐，國民黨要員也紛紛回京，朱紹良經由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第四次會議中通過，再任軍事委員會委員，三月十三日接替桂軍將領白崇禧任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廳長，復因李烈鈞另有要務，奉命兼任辦公廳主任，代行軍委會一切職權。

北伐成功後，全國統一，中央經各地軍頭同意，整理軍事，進行裁軍。中央嫡系部隊第一集團軍率先成立整理委員會，朱紹良任編遣委員會主任，主持整編，任務完成後，軍政廳改為軍政部，由何應欽任部長，朱紹良調任第八師師長，駐防合肥，下轄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個旅。

## 討桂討馮南征北討

一九二九年初春，廣西的桂軍以裁軍不公為由，舉兵反抗國府中央，朱紹良受命率部「西征武漢」。三月二日，第一集團軍的戰鬥序列，委朱紹良為第二軍軍長兼第八師師長，轄第八師、第十三師和獨立第一旅，令集結部隊於霍山附近。五日，朱氏對所部作了統一部署，決定先以四個團集中霍山，第十三師向麻城流玻璃推進，獨立第一旅駐兵六安，他本人率第八師移駐舒城待命。廿七日，第二軍的大部推進至鄂皖交界的英山一帶，朱紹良自己也到了霍山。然後陸續進佔羅田、廣濟、蕪春、黃岡和麻城等地並於四月二日到達宋埠、團風之線。

四月三日，第三路桂軍李明瑞部在黃陂、孝感倒戈。桂軍胡宗鐸、陶鈞和夏威部聞變，即向鄂西方向敗退，計劃據守荊州、沙市和宜昌。七日，中央委當時在黃陂的朱紹良為第二路追擊隊司令，率部追擊。次日，朱氏率第八師、第十三師和獨立第一旅，於九日到達漢川、侏儒山六線，而后繼續向天門、仙桃鎮一線追擊。十一日，第八師到達仙桃鎮，之後由陶峙岳率第八師主力繼續前進，朱於十四日親率第十五團進據潛江。第一路追擊隊司令張發奎當時駐郝穴。這時，蔣中正欲根本鏟除新桂系勢力，於十九日又任命朱紹良為討逆軍總預備隊總指揮，率第八師、第十五師和第五十七師於四月底集中

武漢附近，相機推進。但是，朱紹良正率部圍殲敗退鄂西的桂軍，無法離開。五月，蔣中正和何應欽曾多次電催朱紹良和張發奎「照預定計劃」、「協同進行」、「從速解決」。胡、陶殘部，并增派譚道源的第五十師歸朱紹良節制。朱氏即對兩路軍隊作了統一部署，擬定了進攻荊州和沙市的計劃。不久，胡、陶、夏在中央武力進剿和金錢收買下，接受了招撫，聯名發表通電下野，部隊聽候改編，朱紹良的第八師遂進駐荊州。

參戰的桂軍訓練精良，能征慣戰，號稱鐵軍，竟被朱紹良一舉擊潰，但桂軍潰而未散，北進未成，復整合軍力，東窺廣東，陳濟棠所部遭受壓力，向中央求援，朱紹良復奉命增援廣東。時值桂軍與風作浪之際，原駐湖北宜昌的張發奎部也舉兵反抗中央的蔣中正，聯合甫自國外返回的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所部，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向廣東進兵，朱紹良被擢升為討逆軍第六路總指揮，率第八師、第三師和第五十師入援，十二月五日，第八師開抵廣州，旋即由粵漢路運往粵西前線，於八日到達東莞墟、橫潭、新街一帶，第五十師則由江西進入廣東省境，主力集結於象山山腳下，與張、桂聯軍正面對峙，十二日第八師占領象山，次日，又進駐花縣，解了廣州之圍。隨後，張、桂聯軍北退，朱紹良率部尾追，經過滘江口戰役，迫使張、桂聯軍由廣寧退回廣西境內的懷集、賀縣。次年一月底朱部進逼荔浦時，遭到

桂軍的有力抵抗，被迫後退至梧州。後由梧州經武林進攻桂平，與駐守桂平的桂軍相峙兩個月之久。最後在海、空軍的掩護下，經過慶戰，才於五月十三日進占桂平。桂軍見大勢已去，宣佈仍歸順中央，朱紹良乃率部回南京。

一九三〇年初夏，馮玉祥及閻錫山挑起中原大戰，朱紹良又奉令率部赴隴海鐵路沿線作戰，任左翼軍總指揮，轄第十五軍、第五十二師、第八師和第四十七師負責第四、五、六守備區的防守。中旬，馮玉祥部對朱部的守備區實行猛攻，雙方對峙約一個月。至八月十日，朱部漸感不支，於是決定縮短戰線。十四日，朱部轄區內的湯庄、林庄為馮軍所占。湯庄、林庄是通往寧陵、睢州等的要道，一旦陷落將會對戰爭局勢產生重大影響。於是朱紹良乃率員馳赴陽驛輔督戰。卅一日，蔣中正下達了總作戰命令。根據這一命令，朱部的任務是牽制住馮玉祥部，協同平漢路的友軍對馮部實行包圍，迫使馮部退往陳留、通許一帶而予以殲滅。然而，朱部進展緩慢，于十月一日方奪下通許，四日進占中牟。七日，蔣中正部占領鄭州。隨後，朱部奉令在隴海線北側地區集結待命。

不久，北洋名將上官雲相率部增援，左翼實力大增。朱紹良建議中央把四十七師的兩個旅擴編為四十三、四十七兩師，以上官雲相充任第九軍軍長，兼四十七師師長。此時馮軍也增援向中央軍猛攻，上官雲相率部

堅守歸德至寧陵一線；朱紹良則率第八師及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梁華盛）固守柳河河畔之獨唐集，馮軍以重迫擊炮每日轟射該集四五千發，全村夷為平地，傷亡慘重，馮軍以破斧沉舟之勢，攻擊五晝夜，卒以彈藥耗盡，後繼無力，且晉軍始終停在山西至正定一線，未加支援。而馮軍之孫連仲部不滿馮玉祥所為而向中央輸誠，使馮軍在獨唐集之戰，僅是迴光返照，終於全面潰敗，馮玉祥逃至洛陽，通電輸誠，而閻錫山則始終否認有聯馮反對中央之事。

中原大戰之後，四海平靖，朱紹良得短暫休息，溯自就任第八師長以來，南征北討，席不暇暖，此次凱旋回京，始獲小憩，恰逢四十誕辰，其部屬毛炳文、譚道源及老友張春浦等人，在滬上劉家花園為他設宴稱觴，一時嘉賓雲集，車水馬龍，是他平生難有的一項盛會。

### 圍剿共軍功敗垂成

一九三〇年年底，朱紹良又赴戎機，被調往江西，參與圍剿中共軍區，第一、二、三次圍剿中，均任第六路總指揮，屬何應欽的左翼集團軍。朱紹良部最初由南昌循樟樹鎮、新淦、宜黃、向南城、南豐進擊，所轄為毛炳文的第八師、許克祥的第十四師及五十二師韓德勤部，後來五十二師改隸中路軍，原在臨川、南城的第五師胡祖玉部撥歸六路軍指揮，其後又增調路孝忱的七十一師前

來，兵力雄厚。正值剿共緊鑼密鼓之際，陳銘樞及李濟琛突又在福建稱兵作戰，世稱「閩變」，第六路軍奉命暫緩剿共，抽調部隊入閩，協同蔣鼎文的第五路軍進兵福州，原駐建寧的六路軍前鋒張貞師長的第十二師揮兵建甌，逼近福州，加上蔣鼎文部攻勢凌厲，所謂「福建蘇維埃人民政府」乃告垮台。

閩變既平，第六路軍迅即由南豐攻向廣昌、寧都，可惜陳誠、孫連仲的第一路軍，不習慣山地作戰，進展緩慢，第六路軍孤立無援，遭共軍痛擊，使第五師師長胡祖玉陣亡於廣昌，第八師及廿四師亦被包圍，共軍更趁一路軍空隙，包抄襲擊南豐之七十一師路孝忱部，慶戰三晝夜，直到第八師自廣昌撤回增援，合力夾擊，始將共軍逐退。戰後，陳誠將戰敗責任歸咎朱紹良，指第六路軍輕進，後經中央徹查，朱紹良未受責難，但朱、陳之間從此有了芥蒂。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國民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朱紹良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十二月三日，繼何應欽出任駐江西綏靖主任。十二月十五日，蔣中正第二次被迫下野，臨去前委朱紹良代理南昌剿共總司令，直到次年一月，蔣中正復職為止。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央軍發動第四次攻勢，圍剿蘇區共軍，蔣中正自任總司令，朱紹良任總司令部參議，為蔣中正的軍事智囊。八月，調任湘鄂贛邊區剿共總指揮，十月，開始進軍，朱氏奉令任右翼總指揮，統轄八個師，血戰



五個月，迫使共軍離開赤都，展開其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之旅。

### 駐節西北綏靖地方

一九三三年初春，共軍主力由川西竄往甘肅省境，蔣中正為加強軍事壓力，調朱紹良接替邵力子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他於五月赴蘭州到任，自兼民政廳廳長，親理民衆庶務，八月，受命成立甘肅綏靖公署，兼任主任。

朱紹良到任後，極力團結地方，凝聚力，籠絡西北馬家軍的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和馬鴻賓。馬步芳的一百師擴編為第八十二軍，升任軍長，是朱紹良幫忙。後來，馬步芳升任第四十集團軍總司令，也靠朱的支持。

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朱紹良借助地方實力，消滅了孫殿英這一股軍力。孫殿英原盤踞山西邊境，擁兵自重，不受南京政府節制，一九三三年底，由國民政府北平軍分會出面，任命孫殿英為青海柴達木屯墾督辦，令率部西開，同時，又密令朱紹良指揮人馬沿途截擊，予以消滅。朱依靠其與「四馬」等人的關係，利用他們共同的拒孫入西北的情緒，在蘭州組織召開一次軍事會議，著手進行軍事部署，時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的馬麟表示，只要朱紹良能聯絡各派拒孫去青海，馬首先竭誠擁護朱的部署。

朱紹良的部署計畫，是由馬鴻逵任左翼

軍總指揮，鄧寶珊為右翼軍總指揮，馬鴻賓為右翼前敵總指揮，馬步芳為總預備隊總指揮，部署既定，遂於一九三四年三月，把孫殿英部消滅於寧夏省境內。

朱紹良初掌甘肅省政時，各地縣政仍是沿襲清朝的六科房舊制。一九三五年，他接受胡宗南的建議，委託胡在隴南辦「地方自治人員訓練班」，訓練縣自治人員。一九三八年，朱紹良又呈請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幹部訓練團」，培訓軍政幹部。

接著各縣縣長由省政府委派，錢糧稅款須按省政府統一規定徵收，並一律解交財政廳，各勢力派部隊的編制和糧餉，應分別報中央政府核定，所需軍費由省政府統一撥發。其目的是把甘肅的縣政、財政和軍政，都集中到政府的手裡。然而，實施的結果只是達到形式上的和部分地區的統一，一些地方軍頭依然陽奉陰違，劃地為王，自行其政，任意派糧派款派丁，各地仍是民不聊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呈送行政院的一份文件稱：「甘肅嘉峪關一帶人民相繼去新（新疆）省者，主要原因乃負擔太重，難堪其苦，不得已而逃亡」。

一九三九年，甘肅海原、固原回民實行大暴動，震動西北。朱紹良時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兼甘肅省政府主席，除調派部隊鎮壓外，還將平涼專員以及海、固縣長均換成回民。馬鴻逵曾想插手此事，遭到拒絕。於是馬抓住這件事借機接連向蔣中正非議朱紹良

，稱：「朱公負西北全責，惟對此事似仍用張、陸等以回制漢，以漢制回，以回制回，以漢制漢之舊辦法。」認為這件事與共產黨大有關係，主張「不論回漢只分良莠」，並指朱紹良反共不力，意圖粉飾，認為「大西北局勢因而延誤，將不可收拾」，這些指摘蔣中正對朱紹良頗感不快。

先是一九三五年年初，「長征」的共軍越境甘肅，朱紹良擔任剿共軍第三路總指揮，他統一部隊編制，構築碉堡，八月十四日，紅軍進抵隆德縣，遭劉寶堂部截止，進駐陝西。十月二日，朱氏又任西北剿共第一路軍總司令。當時張學良駐節西安，統籌指揮西北剿共軍事，東北軍于學忠部調入甘肅。

一九三五年十月廿日，蘭州東門火藥庫發生大爆炸，損失慘重，朱紹良因督導不周，辭去甘肅省主席一職，專任綏靖公署主任，省主席由于學忠出任。是年四月三日，朱紹良晉升陸軍二級上將，十一月，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朱紹良應命至西安開會，住在「西京招待所」，和其他將領同時被拘。事變和平解決後，朱紹良被委派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駐節陝西鳳翔，防範共軍蠢動。翌年三月，第三集團軍撤銷，朱紹良回任甘肅省主席，但他未到任，回上海養病，國民政府改派賀耀祖代理甘肅省主席。

「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展開，朱紹

良奉派出任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管理部部长，掌管軍隊訓練。「八一三」事變後，調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開赴上海地區作戰。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央軍分左、右翼和中央三路，對抗入寇的日軍，朱紹良任中央路軍總司令，轄第九、第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在真茹設指揮所，負責黃浦江以西、蘆藻濱南岸地區的戰鬥，十月廿六日，朱部遭日軍壓力退至蘇州河南岸，接著向青浦、白鶴港轉進，十一月十一日，上海陷敵。

此時，國民政府在蘭州成立第八戰區長官司令部，初期由蔣中正自兼司令長官，調朱紹良出任副司令長官兼甘肅省主席，作戰地區為甘寧青及綏遠，當時綏遠是接敵的前線，至為重要。

一九三八年一月，第八戰區長官司令部成立政務委員會，朱紹良在會中提出施政方針，所揭櫫的主要目標，就是「在安定中求進步」，是年十一月，在南岳的軍事會議上，朱被任命為第八戰區司令長官。

## 兩次大捷重創日寇

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任內，朱紹良首在加強隴東十縣國民政府的政治及軍力，向中共盤據的陝甘寧邊區逐步推進，企圖包圍消滅共產黨，他親自制訂了隴東十縣反共工作的「八項方針」、「十二原則」和「特種工作大綱」，把「西北幹部訓練團」第三期畢業生九十餘人派到隴東服務，強化政府力量。

在軍事部署方面，他調派新二軍駐紮隴東，指揮部隊在河西、隴東和蘭州四周構築防禦工事，一方面準備禦敵，一方面壓迫共軍退出八戰區。構築碉堡時，發生一件貪污案，朱紹良調查後，槍斃了失職的兵工廠監班。不久，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及共產黨組織的「甘肅在鄉軍人抗日聯絡委員會」，均被迫自動撤銷，朱紹良的政策奏效。

一九四〇年農曆年前後，盤據包頭的日軍侵襲寧夏，西北震盪，朱紹良手下無軍可派，親率自己的警衛團趕赴銀川，指揮馬鴻賓的部隊對日作戰。

這一年十一月，朱紹良的甘肅省主席由谷正倫接替，他專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到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又奉令兼任陝甘寧邊區總司令，統一指揮陝北的中央軍和共軍，又兼「軍令部西安辦公廳主任」，不過僅領虛銜，實際軍務由胡宗南以代主任綜理。

在此一時期內，朱紹良和入寇日軍打了兩次大戰，五原會戰和潼關會戰，中共宣稱的共軍「平型關百團大戰」就在五原會戰中，這是中共在抗戰八年中唯一的輝煌的戰績。但在一九四二年冬天，甘南發生「民變」，聚集數萬人反抗中央，朱紹良調派了七個正規師，兩個騎兵旅，四個保安團和馬步芳的三個團，費時十月，卒將「民變」救平。

## 勸服盛世才歸中央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間，朱紹良曾

參與綏服盛世才，冒生命危險九次往訪新疆，朱與盛世才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先後期同學，他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時，盛世才是總司令部上校參謀。在西北，兩人仍有往來。一九四二年春，他曾到烏魯木齊去活動。七月初，朱以國民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同專程由重慶來的翁文灝、毛邦初一起，攜帶蔣中正給盛世才的親筆信，到新疆去，與盛世才商談在新疆確立國民政府的統治，以及遣返蘇聯顧問的問題。

隨後，朱紹良由烏魯木齊直接飛往重慶，向蔣中正面報。

與此同時，蔣中正也在重慶接見了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提出有關新疆的外交權屬問題。八月中旬，蔣中正偕宋美齡夫人到蘭州後，定下解決新疆問題的方針，並向朱紹良作了「推進新疆工作之要點」的指示。廿九日，朱紹良陪宋美齡前往烏魯木齊，再一次面見盛世才，才把盛歸附中央的條件談妥了。九月十七日，盛世才逮捕了陳潭秋、毛澤民等共產黨員，並於次年九月秘密處決。蔣中正委盛世才兼任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盛世才曾賦贈朱紹良七言絕句詩一首：

立馬關山憶舊時，重逢塞外費如絲。  
相期不負平生志，大好河山共維持。

一九四四年，盛世才又打算重新與蘇聯建立聯繫，於是炮製了一個「陰謀暴動案」

，以國民黨為打擊對象，於八月十二日逮捕了重慶派去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鑒於盛世才的反覆無常，蔣中正決定將盛世才調離新疆。朱紹良受命著手進行軍事部署，陸續把第四十二軍、新二軍以及甘肅師管區的幾個補充團，調派新疆。八月十八日，朱紹良奉命去烏魯木齊，「勸」盛世才辭職。盛世才應允。廿九日，國民政府頒令調盛世才到重慶任農林部長，新疆省政府主席由吳忠信接任，在吳忠信到任前由朱紹良暫行代理。九月十一日，盛世才離開了烏魯木齊。之後，朱紹良仍在新疆滯留一段時間。

同年十一月，新疆發生「伊犁事變」，回民作亂，朱紹良揮軍進剿，因天寒地凍，交通運輸困難，戰事進展不順。

蔣中正獲報後，於一九四五年九月調張治中前往處理，由地方人士出面協調平息。次年四月，國民政府成立西北行轅，由張治中任主任，第八戰區撤銷，朱紹良才離開西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朱紹良調任副參謀總長兼軍委會委員長辦公廳主任，負責處理軍委會還都南京事宜。

一九四七年三月，朱紹良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五月，調任重慶行轅主任，一九四八年改為重慶綏靖公署，朱紹良仍任主任，轄境為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四省，他竭盡全力輸送兵員物資，支援前線剿共戰事。

## 留守福州獨撐危局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中正總統宣佈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權，朱紹良調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由於他在福建出生、成長，通閩語，知閩人習性，很快即進入情況，在剿共軍事失利狀況下，撤運戰略物資及軍隊來台，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大陸變色後，朱紹良隨湯恩伯總部攜家眷來台，擔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及國策顧問，一度熱心老人福利工作，倡組「老人福利協進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因腦溢血在台北病逝，享年七十三歲，逝世後由蔣中正總統頒發褒揚令，並追晉為陸軍一級上將。（康僑撰）

## 朴正熙（一九二六—一九七九）

南韓前總統朴正熙靠政變奪得政權，亦在政變中失掉生命，還在遇刺時賠上妻子陸英修的生命，真是一大悲劇。

朴正熙於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四日生於忠清南道，青少年時期生活在日本軍閥殖民統治下，遭到高壓欺凌，使他對日本人極為反感。此時，韓國復國志士不斷從事破壞及抵抗的零星消息，不時的傳入他的耳鼓，愛國之心油然而生。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韓

國復國成功，但國破民弱，愛國青年朴正熙乃投身軍校，矢志從軍報國。一九五一年韓戰爆發，朴正熙為下級軍官，隨軍作戰，表現英勇，逐級升遷。韓戰結束後，南韓整軍經武，大量擴軍，積有戰功的朴正熙，不久即被擢升至少將軍階，出任第二軍副司令，追隨司令張都暎中將，戍守首都漢城近郊，由於是首都衛戍部隊，第二軍的裝備極為精良。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漢城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變動，第二軍副司令張都暎中將及朴正熙少將合謀，主導發動「五一六軍事革命」，推翻了文人政府，開啟了南韓「軍人干政」的濫觴，也種下南韓「軍事文化」的特殊政治景觀。後來效法他們如法炮製軍事政變的全斗煥、盧泰愚兩人，於和平交出政權後，目前正面臨文人政府的追訴和清算。朴正熙如果未死，也難免同一命運。

張都暎和朴正熙主謀的政變，於當天凌晨開始發動，漢城城內南山一帶照明彈此起彼落，照耀得如同白晝，汝矣島到麻浦區的漢江大橋附近，槍聲不斷，通往市區要道的交通全被封鎖，荷槍實彈的士兵旋即控制了政府的每一機構，到了第二天早晨，政府首長全換了新局面，張都暎成了元首，各部會的領導職位全部由軍人接替。從此，南韓軍人從政成了慣例，也開了惡例。

不過，張都暎的元首位置只坐了兩個月，即在一場內部的權力鬥爭中被鬥下去，朴

正熙成了握有實權的領袖，職位是「國家再建最高議會」議長，實際上主宰一切，張都暎被以「反革命」罪起訴，判了廿年徒刑，鄭鎰入獄。朴正熙任議長職位約半年餘，羽毛已豐，即由國會推舉為總統，從此開始他的專制獨裁統治。

然而靠政變奪得政權的朴正熙，對南韓的貢獻是正面的，他的政府在政治民主、保障人權及社會正義方面雖然不及格，但在帶動南韓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成就非凡，他延攬專家辦工廠、創企業，開展交通建設，短短數年，使南韓的經濟發展，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有成就後，每年撥款一千三百億韓圓重建農村社區，使南韓的窮鄉僻野，也可以看到整潔的房舍，寬闊平坦的馬路，頗有歐洲先進國家的風貌，這些都是朴正熙足以傲人的政績。

然而一九七四年初春，正值朴正熙躊躇滿志時，在主持一項運動會時，朴正熙遇刺，而稍高的講堂救了他的命，可是站在他身後的夫人陸英修則未能逃過劫難，重傷而死，朴正熙成了鰥夫，大難未死他，對自己的安全更加注意，嚴密防範。不料奪命殺手就在身邊，到了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他前往參加一項慶典時，他的侍衛長金載圭上校竟掏出手槍，在距離內向他連續開槍，靠槍桿子起家的朴正熙最後還是死在槍口下，他一共享了十八年的榮華富貴。

朴正熙本人下場如此，他的子女也沒有

好結果。在他死後的次年三月，他的獨子朴志晚因吸毒被收押，立即轟動南韓，依照南韓吸毒的刑罰很重，但南韓人士感戴朴正熙的功勳，有許多人請願要求釋放朴志晚，其中包括曾被朴正熙政府司法體系判處死刑的前學生領袖、國會議員李哲在內，他們認為朴正熙自身的遭遇已夠悲慘，他的獨子可以原諒了。不過，軍校出身的朴志晚從此斷送了大好前程。

而朴正熙的兩個女兒，朴權惠和朴權暎，自一九七四年母親死後，即為爭奪為紀念其父母而設立的「育英財團」領導權，反目成仇，不相來往，姐姐朴權惠自母親死後，一直陪在父親身邊，代理「第一夫人」的角色，並擔任「育英財團」董事長，及朴正熙創辦的大邱「嶺南大學」董事長，並任「朴正熙、陸英修紀念事業會」理事長，因為用人不當，被一名牧師坑了不少錢，其妹朴權暎即以此為藉口，要其姐讓位，兩人纏訟不休，成了南韓的新聞人物，也給南韓人民增加了不少談助。（劉先軍撰）

## 武元甲

(一九三二—一九八六)

北越國防部長

北越政權副總理

北越武裝部隊總司令

## 一生最崇拜拿破崙

北越前國防部長武元甲曾是越共著名的戰略家，號稱長勝將軍。但他出身小地主，和共產黨要求赤貧的身分不同。他在北越軍中竄升到無人能比的地位，全憑戰功。六十年代，他是北越國防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集軍政軍令大權於一身，不過，共產黨政權一向都是「黨指揮槍」，所以武元甲雖擁有軍權，在政府中僅兼了個有名無實的副總理而已。

武元甲生於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家鄉在北緯十七度線附近，戰亂頻仍，因為越共游擊隊反抗法國殖民軍，經常在打仗，少年武元甲親見法軍殘暴，種下仇恨西方人的種子，十七歲即參加共黨游擊隊，偷襲法軍，十八歲被捕下獄，不久釋放。

雖在少年時代即開始打游擊，但武元甲不是平凡的武夫，他畢業於河內大學法律系，知識程度相當不錯。不過，這個法律系畢業生，沒幹過一天和法律有關的工作，卻對歷史情有獨鍾，當過一所中學歷史教員，也花了一番功夫研究越南史，對越南自古即受外人統治相當憎恨，由於中國人曾長期統治越南，所以他憎恨的對象包括中國和法國。

武元甲最崇拜的對象是拿破崙，亦以拿破崙自居，希望成爲一個青史留名的卓越軍事家。他是越共頭子胡志明的密友，兩人從進行「越南獨立運動」時，即開始合作，是長期盟友。二次大戰時，越南淪入日本人手，武元甲追隨胡志明於一九三八年逃到中

中國大陸，這時他已是越南游擊隊首領，在雲南地區接受美軍情報訓練和中國軍方的戰技訓練，多次潛回越境，重創日本佔領軍。二次大戰後，武元甲揮軍回越，和法國佔領軍作戰，謀「解救」越南，脫離法國殖民統治。在他逃亡中國期間，他的妻子和妹妹，因抗法被法國人囚死監獄，益增其仇法心理。而於奠邊府一役，由他指揮的北越游擊隊痛殲法軍，迫使法軍撤離越南，建立了「越南人民共和國」。使他成爲北越的英雄，名望僅次於胡志明，軍階亦升至四星上將。

由於美國人插手越南，於法軍撤走後，越南以十七度線爲界，一分爲二，共酋胡志明心有未甘，發動反抗美國的游擊戰，軍人武元甲當然是要角，策劃指揮作戰，屢獲戰果，聲望和名氣也隨之大增，卻導致其他越共頭目的嫉恨，屢遭藉故打擊，地位也告下降，最嚴重的兩次是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六〇年，因爲他在越中和美越（南越）聯軍作戰失利，被剝奪軍權，有好幾個月沒有露臉，但擅長游擊戰的他，最後仍被抬了出來，面對艱鉅。

在北越政權的十個頭目中，親蘇俄或親中共，立場並不一致，大致可以分爲親中共派和親蘇俄派，而且每派各佔五人。親中共的五人是：黎笋、長征、阮際清、黃文歡、黎德壽。親蘇俄的五人是：武元甲、范文同、黎清義、范雄、阮維楨。武元甲就是親蘇俄派的首領。武元甲一向不隱瞞他不信任和

不喜歡中共，這可能就是他過去在爭權的過程中數次遭受挫折都因爲中共也對他不滿，想盡辦法來打擊他，不使他得勢。胡志明能夠把武元甲的地位維持住，可說是費了相當苦心。

一九七四年南越潰敗，美軍撤出越南，越共統一了越南，長達二十餘年的戰爭結束，武元甲成了國防部長，位置雖高，卻始終未能接替胡志明做一號人物，而於一九八六年病逝，享年七十四歲。

### 文人出身戰場成名

武元甲雖在戰場成名，但他未進過軍校，不是軍人科班出身，而是文人出身。他曾自豪的說：「他唯一進過的軍校就是叢林」。他所寫的一本「叢林游擊戰」的書，早已被全球共黨奉爲教範的教科書，人人要讀。貴爲名將，高做越共領袖，但武元甲生活簡樸，他不抽煙、不喝酒，待人溫和和禮，從外表看來完全不像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徒。可是他在「解放」南越的戰爭中，每佔領一地，即燒盡殺絕，那股狠勁令人不寒而慄。（黃森木撰）

### 喜饒嘉措（一八八三—一九六八）

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  
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中國佛教學院院長

喜饒嘉措出生於青海省循化縣的一個藏族家庭。幼年在循化古雷寺出家，後在甘肅拉卜楞寺及拉薩哲蚌寺學經十餘年。卅二歲時，在拉薩考取「拉仁巴」格西學位（西藏喇嘛教最高學位），曾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命，主持重刻「甘珠爾」大藏經，任總校編。他是藏語系文化學術界的知名學者，在西藏講學多年，三大寺及前西藏地方政府高級官員多是他的門徒。國民政府執政大陸時期，他被聘爲國立五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西藏文化講座講師，並任歷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中共建政之後，先後擔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及文教委員會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一九五一年初，喜饒嘉措到了北京，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親切接見了他。毛澤東還特意送給喜饒嘉措一部小汽車和幾台收音機，供他使用。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喜饒嘉措曾多次到電台廣播講話，又親筆寫信給達賴喇嘛和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任職的學生，勸導他們接受和平解放，走愛國的光明道路，爲和平解放西藏作出積極貢獻。一九五二年，有人製造謠言，說什麼世界即將毀滅，「有飯無人吃，有路無人走」，在青海、蒙古、藏族群眾及各喇嘛寺廟

中造成極大混亂。喜饒嘉措發表「駁假預言，掃除黑迷霧的智慧太陽之光」及「先行的書信——甘露珠」等文章，從佛教的經論出發，痛斥反革命謠言的荒謬和無恥，對穩定民心，安定社會秩序，維護民族團結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來，劉少奇當面稱讚他：「喜老，你的文章寫得好。」毛澤東也曾親筆寫信給他，表示鼓勵。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喜饒嘉措擔任第一副會長；同年九月，會長圓瑛法師圓寂，他便任代理會長。一九五五年八月，全國佛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喜饒嘉措正式當選為全國佛教協會會長。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國佛學院成立，喜饒嘉措出任院長。一九五七年二月廿七日，喜饒嘉措參加了毛澤東召開的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當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資產階級要改造，工人階級也要改造時，對喜饒嘉措說：我這個人從前也是知識分子，各種思想都有。喜饒嘉措先生，你那個佛教我是拜過菩薩的，我朝過南岳山，為我母親還願。我信過無政府主義……又信過康德的唯心論，你看我這個人多複雜。毛澤東的這些話，反映了他與喜饒嘉措的感情是很親密的。

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被平息之後，喜饒嘉措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表示堅決擁護政府的平叛決策。他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發言和兩次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中，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

糾集叛匪，進行武裝叛亂，是一件最可惡的事情。他們違反了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了祖國，也背叛了佛教教規，為國法教規所不能容。」喜饒嘉措還根據大量的歷史事實，嚴辭駁斥了「西藏獨立」的謬論。他又列舉解放以來黨和政府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種種事實，駁斥了所謂共產黨破壞佛教的論調。毛澤東後來在最高國務會議期間，曾找喜饒嘉措談話，稱贊他對平息叛亂所作的努力。

談話時，兩人還合影留念，喜饒大師十分珍視這張照片，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遺失了。但喜饒嘉措決不一味歌功頌德，他對共產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也敢於尖銳地提出批評。他在批評一九五八年甘肅、青海藏族地區平叛工作中一些違反宗教政策的錯誤做法時指出：有的人不研究共產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認為宗教是迷信，應一破了事。於是產生了毀寺廟，砸佛像，遣散僧侶，禁止念經，甚至對某些有宗教色彩的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也加以禁止等做法。這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他還坦率地指出，我們個別領導同志和一些幹部，由於長期生活於和平環境，在不斷取得成就面前產生了驕傲自滿、唯我獨尊等傾向。可是，喜饒嘉措的這些苦口良藥，在六十年代初期反對統一戰線和民族政策、宗教工作的「投降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中，被錯誤的批判。一九六四年年底，喜饒嘉措被遣送回青海老家批判。文革當中甚至被打斷左腿，折磨而死。（格桑

群覺撰）

### 李源棧（一九〇一—一九六九）

李源棧，字逸仁。民國前二年（一九一〇年）二月二日生於台灣省高雄縣湖內鄉文賢村。父李智信，母杜氏。育源棧等兄弟十人，源棧居長。

源棧少年畢業於台灣商業學校，再赴日本東京就讀郁文館中學；後入日本岩手醫專，完成醫學士的學業。畢業後留任該校附設醫院小兒科副主任、岩手縣所屬之東山醫院小兒科副主任，醫術精湛，受到人們的重視。

源棧廿八歲時，與魏鶯霜女士締結姻緣。魏氏畢業於台南一女中、岩手醫校助產科，並研讀師範學校一年。伉儷情深，育有五男六女，家庭幸福美滿。

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後，源棧自日本返回定居於高雄市左營區，開設李源棧醫院，醫德醫術堪稱第一。當時由於政府洽辦接收日軍財產事宜，借重李氏對商科的學識經驗，委聘為海軍官產移交總務之職，事後圓滿達成任務，深得海軍總部的讚許，海軍總部與高雄市政府均延聘李氏為顧問。李源棧對地方建設也產生濃厚的興趣，與地方父老鄉親交往頻繁，廣結善緣，得到各方的支持愛護，於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高雄市第二屆市議員選舉時，在左營區以第二高票當選，



四十三年十二月，在左楠選區，又以最高票連任第三屆市議員。任期尚未屆滿，又參加台灣省第三屆臨時省議員選舉，以最高票當選，從此，李源棧成爲高雄市黨外最受重視的人物，同時是「五虎將」之一。「五虎將」是：吳三連（一八九九年生）、郭國基（一九〇〇年生）、李萬居（一九〇一年生）、郭雨新（一九〇八年生）、李源棧（一九〇一年生）。因此他的聲譽與日俱增。

當時，台灣政壇菁英，均集中在省議會。相形之下，國代、立監委，都沒有省議員風光；問政的焦點，也沒有省議員來得擲地有聲、鏗鏘有力。

「金光頭」是李源棧的獨特標誌。三十出頭就成爲禿頂名人，在當時政界人物中，陝西的「光頭上將」劉玉章，可與之相呼輝映。

李源棧在省議員任內質詢的事項，很受執政的國民黨重視。當時的省警務處長，曾按鈴控告李源棧涉嫌誹謗，最後雙方和解了事，結束了一場爭論。

第三屆臨時省議會中期，更名為正式「第一屆省議會」。

民國四十九年四月，第二屆省議員選舉，李氏競選連任，執政黨保留一席給他，結果他再度以最高票當選，李氏的聲望達於顛峯。而「五虎將」之一的吳三連，退出政治圈，不再競選，專心的從商去了。

民國五十二年，第三屆省議員選舉，在

高雄市另有五位非國民黨籍的人士參選，聯合攻擊李源棧，但他仍以最高票當選，於是李源棧有「不倒翁」之稱。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李氏因心臟病逝世。

李氏爲人任俠，富正義感、愛國心。愛好音樂、體育。數屆議員任內，表現得極爲良好。李氏最爲人樂道的是：「二二八事變」時，地方動亂，蔓延到左營區，李源棧適時挺身而出，用族群和諧，理性問政，反對暴力，安定進步的謀略化解了警民衝突，避免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值得後人永遠感念難忘。（謝起群撰）

### 廖祖述（一九二一—一九九六）

台灣警備總部政戰部中將主任  
總政戰部中將副主任執行官  
華視文化公司董事長

#### 人窮志大從軍抗日

廖祖述，江西奉新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廿日生，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因心臟病在台北逝世，享年七十六歲。

他的父親廖篋卿，厭憤滿清政府腐敗，棄官從商，講求信義，很受鄉人敬重，可惜英年早逝。母親勤儉持家，然因當時赤禍猖狂，民不聊生，携兒帶女，東躲西藏，沒有一天安寧過，因憂勞成疾，在他十歲時也逝世了。兄弟姊妹四人，頓時成爲孤兒，不得

已各憑命運分散投靠親友。

幼年曾入私塾，背誦古書，奠定了國學的基礎。後來讀江西省立第一中學及國立十三中學，受名師教導，使他的愛國情操和奮鬥精神大受啟發。

一九四二年夏他在江西吉安高中畢業和同學廖學賢，人窮志大，克服種種困難，費盡千辛萬苦，且冒日軍襲擊的生命危險，經長途跋涉，由江西到達重慶，考上了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但身無分文，靠打工及公費維持學業。

一九四四年當他唸到大學二年級時，爲了抗日救國，到處掀起了青年從軍熱潮，他是班上自治會的聯絡員，因籌劃歡送從軍同學的送別茶會。在從軍同學離校那一天，他在歡送群中，跟著載送從軍同學的大卡車後面，熱情沸騰，一邊跑一邊揮手擦淚，忽然有一位車上的從軍同學，把他拉了一把說：「老廖，上車吧！一同打日本鬼子去！」他就這樣自送行行列中從了軍，艱苦奮鬥，冒險犯難，一幹四十多年，從少校升到中將，從連指導員升到國防部總政戰部副主任執行官。

從軍以後被分到中央幹部學校，在重慶復興關畢業後派赴二〇七師工作，擔任連、營指導員、秘書等職務。歷經雲南練兵，上海防禦，長城戍守，關外苦戰等，他深深感受到戰爭的勝負，和士氣的強弱有密切的關係，而士氣的強弱，又繫於政治作戰的好壞

一九四九年來台灣後，曾進入石牌高級情報研究班第三期，革命實踐研究院聯戰班第九期，政治作戰研究班第三期，國防大學召訓班第三期，三軍大學將官班第三期等機構受訓，對革命情勢的研析，參謀作業的磨鍊，政治作戰鑽研，戰略戰術的修養，領導統御的講求，都有更深的進境。

廖祖述曾擔任陸軍軍官學校復校後第一總隊的政治主任，政治作戰學校改制四年首任學生班的上校主任，第三軍、憲兵司令部、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主任、警備總部政戰部中將主任，最後調總政治作戰部中將副主任執行官。

在黨務方面，曾任特種黨部書記長、金馬戰地政務特派員、第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三、十四兩屆中央黨務顧問，長期從事政戰工作，尤其對於總體戰的鑽研，戰地政務的落實，後備軍人組織的開展，文宣工作的強化，眷村改建的推進及為民服務等方面，都能步步落實，很有績效，甚得當時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化行）上將的信任。

一九八四年三月奉令退伍，先後奉頒雲麾、忠勤、金甌、景風、弼亮、光華、干城等勳章獎章四十多座。

退休後轉任華視文化公司董事長及黎明文化公司、台灣日報董事等職。

### 無私無我盡瘁政戰

他一生無私無我，盡瘁政戰，尤其從事軍中教育，培育英才，桃李芬芳，將星雲集，都是建軍備戰的中堅，革命大業的繼承人。他寧靜淡泊，才華內斂，冷靜均衡，平易近人，很喜歡做好事，成全他人，他的座右銘是：「做人誠誠懇懇，做事實實在在，講話簡簡單單，用錢乾乾淨淨；事急心不急，人忙我不忙，白天跑基層，晚上看公文，車

上想問題。」

廖祖述將軍夫人張德容，是關東望族，秀外慧中，操持家務，崇尚儉樸。長女若蕙服務公職，幼女若茵，服務於報社，女婿謝復生任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主任，幼子剛明，媳婦馬靜如服務於大眾傳播，有孫二人，外孫（女）四人，融融樂樂，家庭美滿。（王培堯撰）

# 陳濟棠傳

林華平著 定價新台幣參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林華平先生的精心傑作，篇篇精彩。要目有：陳濟棠的早年、討伐陳炯明與二次東征、北伐軍中南天一柱、躍登龍門，編遣兩廣部隊、兩廣恩仇記、兩次出國、胡漢民被扣與寧粵分裂、西南兩機構、陳濟棠的取不術、反蔣？擁蔣？建設廣州、創辦燕塘軍校、廣東工業建設與建琶江兵工廠、西村士敏廠、六個新式糖廠、硫酸廠與電解廠、肥田料廠、造紙廠、吸引僑資、英雄、美人、悼亡、提倡讀經、興學育才、設立基金、扶翼後輩、請纓抗日壯志未酬、廣東三軍離散經過、共赴國難、出長農林部、香港脫險記、大難不死、臨危受命接長海南、勇者不懼、瓊海撤退、大樹傾頹巨星隕落、陳濟棠年譜等篇，附珍貴歷史圖照二十五開本五百六十八頁歡迎購閱祇收成本費台幣參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款到立即掛號寄書。